

清初僧道忞及其《隨年自譜》考論

郭鵬飛*

摘要 清初僧道忞《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撰於順治十三年61歲時，應是他的周甲自述。是譜僅書至崇禎十三年，以後不載，應是經過了道忞本人或後人的刪削。譜中崇禎二年、三年條涉及清初濟、洞僧諍問題。費隱通容因《五燈嚴統》成了僧諍的焦點，而道忞也有《禪燈世譜》，卻沒有受到影響。是譜一直以鈔本流傳於大埔民間，民國時溫廷敬等修《大埔縣誌》首次著錄，至今見存的至少有五六個版本，文字大同小異。饒宗頤、汪宗衍、冼玉清、陳垣、羅香林、賀光中、陳寅恪、姜伯勤等學者都曾抄閱或研究相關問題。

關鍵詞 木陳道忞；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清初僧諍；傳鈔源流

《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下文稱《自譜》），鈔本，不分卷。明末清初臨濟僧道忞撰。道忞字木陳，號山翁，晚號夢隱道人。道忞為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鄉林氏子，俗名蒞，是清初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著名僧人。弱冠補諸生後不久，道忞即於廬山開先寺出家為僧，禮若昧智明為師；受具足戒於愍山德清，嗣法於密雲圓悟。崇禎十五年（1642）密雲圓寂後，道忞繼主天童寺法席，居五年（主事三年），退居慈谿五磊山之靈峰寺，迭遷雲門、廣潤、能仁、道場、大覺諸剎，復回金粟，再住天童寺。順治十六年（1659）春，清世祖召其入京，留大內。次年，受賜號弘覺禪師，道忞請辭還山，仍住天童。晚年又開平陽大剎，因造塔於化鹿山之麓。康熙十三年（1674）卒，世壽七十九。另著有《布水臺集》《百城集》《九會錄》《北游集》《語錄》《禪燈世譜》等著作傳於世。

*郭鵬飛，中山大學中文系2015級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一、撰譜時間及刪削問題考

關於撰譜時間，1952年汪宗衍致陳垣書云：“惟一歲條云‘不席煖者四十年’，二十歲條云‘自此奔走道途不下三千里’，似作於六十歲時。此乃殘缺不完之本。”¹又，1960年汪寄冼本《題記》云：“丙申一歲條云：‘播北遷南，坐不煖席者四十年。’乙卯二十歲條云：‘此自奔走道途，歲不下三千里矣。’以二十歲後奔走四十年推之，殆作於順治十三年六十歲，時北遊之前也。惟自明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起，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即止，以後不載，殆在殘缺歟？”²賀光中先生《題識》謂：“譜中‘校’作‘較’、‘檢’作‘簡’，猶避明諱，當作於北遊之前。丙申一歲條云：‘播北遷南，坐不煖席者四十年。’乙卯二十歲條云：‘此自奔走道途，歲不下三千里矣。’以二十歲後奔走四十年推之，殆作於順治十三年六十歲之間。”³冼玉清亦同此說。⁴

不過，以上推算似不很準確。按丙申一歲條云“予幸薙得免，然生平多譽多毀，播北遷南，

坐不席煖者四十年”，是謂薙染以後至撰斯譜，其間有40年。20歲乙卯條云奉父命獨往省城，補弟子員而還，“然自此奔走道途，歲不下二千里矣”，據此可知，道忞在赴廣州前尚未離鄉，所謂“自此”是指20歲開始奔走道途，此時只是東西往返且尚未鬚首，所以20歲非“播北遷南”之年。又，21歲丙辰條云“赴循州歐陽曉心西席之請”，既“聞南海有大智師，少林有洞上宗主，擬於是處卜求薙染。行五百里至江西漢仙巖，邂逅荊楚僧，相攜至廬山開先寺見受業先師昧和尚，皈依焉”，則21歲才是道忞薙染且播北遷南之年。因此，所謂“坐不席煖者四十年”者，當自丙辰算起。以萬曆丙辰（1616）21歲後推40年為順治十三年丙申（1656），道忞時年61歲，即是譜所作年也。時在北遊之前三年，應是道忞因年已週甲而特意撰寫的生平自述。

《自譜》所記始於道忞出生之年（1596），止於崇禎十三年（1640）45歲條，此後15餘年事則闕載。汪宗衍先生謂“此乃殘缺不完之本”⁵。賀光中先生指出是譜“似非全書，蓋忞生平好諍，自謂亦多譽多譏，其有所避忌，移寫時遂芟薙之歟？”⁶洗玉清先生也認為是譜“蓋未完之書”⁷。那麼，究竟是未完成，還是完成後作了刪削呢？

觀道忞在北遊前所為詩文率多血性文字，滿懷孤臣遺恨，與抗清志士時通聲氣。甲申以後，道忞每逢崇禎祭日必行祭禮，並作詩文以為悼念，至順治十五年仍有《戊戌暮春十九之作》五首悼念崇禎。“在清初的反清復明活動中，江南居士中的英雄人物首推黃介子，而在禪林中，領導反清潮流的首推天界寺覺浪道盛禪師。”⁸在此期間，道忞不僅集志士同人詩文編為《新蒲綠》一書，且視黃毓祺、覺浪道盛等反清勢力如同知己，往還十分密切。關於道忞在明亡後北遊前的思想狀況，姜伯勤先生《論木陳道忞——潮陽大埔林荻與清初禪宗史》一文對此所論甚詳。其論道忞與黃毓祺一節略云：“在甲申後一年直至甲申後十年，道忞不斷在公眾場合表達故國之思，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以致黃介子在臨刑前以贊文付道忞。大抵此後直至其入

京見順治之前，亦未辜負介子的期望。”⁹關於黃毓祺反清事，亦可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復明運動》。從道忞與黃毓祺、錢謙益的密切關係亦可推斷，明亡後十餘年中，道忞其實一直在暗地裡參與復明運動。《自譜》既撰於進京之前，猶避明諱，而全譜卻幾乎不見任何過於性情化的血性文字，應該說刪削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首先，崇禎末年至道忞撰譜之年，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劇變，尤其是江南地區最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與事蹟，而道忞也一直都是積極參與反清的方外力量之一，然而譜偏偏止於最宜大書特書之際，頗乖情理。如果認為它是“未完之書”，恐怕是有很多可疑之處的。就拿道忞作於順治十三年（1656）的文字來看，《覆柴庵吳相國》書云：“伏承來翰，滿紙忠膏義血，不忍竟讀。先皇，英主也，乃數窮百六，喪厥家邦。回思甲申三月之禍，寧獨閭臺疾首，即草莽如殘矧，亦復痛心不已矣！……雖然，說夢癡前，恐成剩法，不有閭臺之節義錚錚，彼鼠肝其父子、芻狗我君臣者，必將假託乎斯言，而人道不幾漸滅與？山僧二十年前即知海內有閭臺一人，今來昭陽，蒙不棄夷，卒惠教先我，則愈有以知乎閭臺也。”¹⁰文中“昭陽”是興化的古稱。柴庵是吳牲晚年的別號。吳牲，字鹿友，揚州興化人。因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所以道忞稱他為“吳相國”。國變後，吳牲隱居興化家中。當時嶺南仍在堅持抗清，鄭成功在東南沿海負隅頑抗，江南雖已淪陷，而復明之心不死並在暗地不斷活動的仍大有人在。道忞曾受黃毓祺臨終期託，亦由此寄給吳牲的書信可以看出，他至此仍未放棄復明的想法。

其次，關於道忞的傳記，大多材料轉相抄引，惟清宋嗣京（康熙）《埔陽誌》卷六收錄的道忞堂侄林于達所撰《弘覺禪師傳》¹¹與各傳不同。該傳提供了道忞《自譜》是經過刪削的可靠證據。細考林氏《弘覺禪師傳》可以推斷，其所依據者有二：一為《大埔林氏族譜》；二即此道忞《隨年自譜》。出於《族譜》者如：“俗姓西河林氏，世居晉安，閩人也。中葉十五世祖官潮，家大埔，乃為粵

文藝研究

人。始祖八十八公方徙居同仁社之新豐里。”這些材料都是林氏族人較為容易查知的。¹²但是，林氏《弘覺禪師傳》中下列數語，明顯都是直接摘自道忞《自譜》：“次歲，赴齊昌西席，因閱《大慧語錄》，則夙世腰包行腳之狀，歷歷如見，真若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出家之志，於茲已決”；“適有天池僧來述師父在黃龍諸處尋師，昧師咨嗟顧師曰：‘出家固善矣。然使父跋涉山川，蒙犯霜雪，功多而過亦不少，且爾年幼學道之日尚長也’”；“故密師《語錄》前後皆師記述，十年之間未嘗少弛其任。”今所見各抄本《自譜》中均無“且爾年幼學道之日尚長也”之句，且各條文字皆極簡略。又，林氏《弘覺禪師傳》云：“歲次壬申，密和尚趨寂玄通（通玄），輦歸天童，因入天童祭奠，即欲出山，勤舊留補歲譜，因侍龕焉。同門兄弟遂舉師繼席天童，堅辭不獲，遂以癸未二月請入方丈，主院事。”壬申是壬午之誤。是年夏七月道忞本師密雲悟和尚圓寂，次年（即崇禎十六年）二月，道忞繼席天童。此皆道忞自述之語氣而經林于達稍事修改者，而今譜亦不存。故今所見《自譜》實乃經刪削之本無疑矣。由此亦可推斷，道忞示寂後，《自譜》殆由堂姪輩保存於大埔家中，一直在族人中流傳。

那麼，《自譜》究竟是道忞自刪，還是族人所刪的呢？我們認為兩種可能都存在，後者刪削的概率要大一些。

先論道忞自刪的可能性。順治後期頗耽禪悅，同時也是出於統治政策的需要。姜伯勤先生《論本陳道忞——潮陽大埔林荻與清初禪宗史》指出：“（順治十六年）九月當順治帝召見木陳時，鄭成功於七月攻瓜州後，九月攻崇明。順治帝在此時催木陳入京，是為了籠絡宗教界、思想界的知名人物，消弭江南的反清復明運動。木陳在此時的轉向，確實適應了順治的需要。”¹³因此，順治十六年召道忞入京，受賜弘覺禪師，實為道忞從“故國派”轉為“新朝派”的轉折點，是他一生思想言行的分水嶺。¹⁴這一年，道忞接到入京召見的消息，竟請國變後名聲狼藉的錢謙益再作《天童塔銘》（錢氏亦極憎惡漢月和尚），於是

引起了漢月法藏弟子們的強烈不滿，此為陳垣先生所稱“天童塔銘第二諍”¹⁵。此事實因道忞忌妒漢月法嗣繼起弘儲的得勢而起，屬於宗門內訌。道忞為了排斥侄輩繼起的勢力，於是借順治帝的召見來排除舊勢力，而順治帝對他的禮遇，最終促使他走向了以復明為宗旨的“故國派”的反面。因此，賜還以後，道忞趁着煊赫的聲勢因一件小事（“密雲密佈”匾）挑起了對弘儲和尚的發難。道忞自此更加以新貴自矜，對以弘儲為代表的遺民派充滿了憎恨，言辭極為兇惡酷烈，全然與當年一同質獄東甌之時判若兩人。¹⁶質獄東甌之往事是道忞與弘儲關係親密的時期¹⁷，而賜還之後道忞卻反而責怪弘儲，前後態度差異如此。康熙九年，在緇流士林名聲皆已掃地的道忞竟又撰《從周錄》一書為自己的變節作開脫。陳垣先生認為此書之作，“所以革洛邑頑民之心，而消其細柳新蒲之感者也”¹⁸。這就是道忞可能後來自刪該譜的動機。

再論後人刪削的緣由。宋嗣京《埔陽誌》刊於康熙二十五年，去道忞圓寂已12年。然而林于達所見道忞《自譜》仍較今本為完善，且道忞在世時並未刊刻流傳，則康熙時道忞原書是完全本也是可能的，今見各本自然就是林氏族人刪削後流傳出來的。後來，雍正、乾隆二帝皆極厭惡道忞之為人，都曾諭旨查禁（如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不許私藏其書，甚至《順治朝實錄》凡涉及道忞處也多有刪削。¹⁹所以，即便《自譜》以原作傳於後世，受康乾以來文字獄的影響，後人出示傳鈔亦必大幅刪削。

二、《自譜》與僧諍問題

1940年，陳垣先生完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藉以表彰明末遺民之民族氣節，首次大量採用僧人語錄等內典作為史學研究之材料。次年1月，又撰成《清初僧諍記》²⁰，抨擊那些甘於附逆、投降仕敵者。《清初僧諍記》一書主要論述清初東南法門紛爭。書中將法門僧眾劃分為故國派與新朝派兩種，圍繞二者之矛盾展開，道忞正是處於風口浪尖

的最重要的人物。可惜《自譜》於崇禎十三年以後事闕載，以前事則大幅刪削，但《自譜》仍保留有涉及臨濟、曹洞之諍的材料。

費隱通容撰《五燈嚴統》，“前二十卷悉本《五燈會元》，僅將天皇悟以後各代，及雲門、法眼二宗，《會元》所標為青原下幾世者，改為南嶽下幾世，又將卷六末末詳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慧經弟子）等於其中，即謂之《嚴統》。”²¹天皇、天王之諍本起於北宋，《林間錄》誤引玄素偽碑文，以道悟嗣馬祖。而皇、王二字本為傳寫偶誤，而好事者據以謂天皇屬青原，天王屬南嶽，謂雲門屬天王自當歸南嶽，於是導致雲門改屬，爭論不休。此問題前人已多辯之，詳參陳垣先生《清初僧諍記》及《釋氏疑年錄》。但是這次起諍的焦點不是舊話題之雲門改屬，而是費隱通容誤信《林間錄》及《佛祖通載》，將曹洞宗之無明慧經、無異元來列在“末詳法嗣”之下，謂湛然圓澄來源無據。

順治十一年（1654），費隱通容刻《五燈嚴統》成。當時曹洞宗壽昌派元來弟子覺浪道盛（此外還有道雄、道闡、道密、道獨、道嚴、道奉、道丘等）及曹洞宗雲門派湛然圓澄弟子三宜明孟（此外還有明方、明復、明雪、明懷、明徹、明有等）是兩派較為著名的高僧，面對臨濟僧費隱以“嚴統”之名，公然挑釁，排斥兄弟宗門，拒人千里，於是不得不起來反對，成為原告之兩方代表。但《清初僧諍記》並沒有討論通容為何撰《嚴統》以及晚明曹洞宗在燈譜問題上面臨的尷尬處境。

曹洞宗盛於晚唐，至宋而衰，到明代忽然復興，中衰時代的傳承世次成了一個難以查清卻又繞不開的問題。僧諍的焦點是壽昌系的來源問題。壽昌無明慧經的弟子永覺元賢在《博山語錄集要序》中云：“我曹洞一宗，盛於唐，衰於宋，至元年復盛而實衰，其故蓋難言矣。”²²張雲江先生指出：“這是晚明時期曹洞宗遭遇到的一種尷尬情形——之所以‘尷尬’，是因為洞宗在晚明復興，勢力已駸駸染堪與臨濟宗相抗衡，而尋求禪道傳承來歷，則自天童如淨禪師以下傳承至今，三四百年間，十數代世次模糊不清。這是當時曹洞宗禪道傳

承中的‘軟肋’。遠門淨柱在1645年編撰成的《五燈會元續略》，即有通過撰寫燈錄重新建構禪道傳承權威的意圖。”²³可見洞宗燈譜問題是一個晚明禪宗界經過持久發酵的重要問題，也是當時很多僧人爭撰燈譜、自譽正傳的原因²⁴，例如，永覺元賢就撰有《補燈錄》《繼燈錄》。但是文獻闕如，強行建構，難免會牽強附會、漏洞百出，不僅曹洞宗僧眾有疑，臨濟僧眾也不讚同這種做法。

《自譜》崇禎二年己巳（1629）三十四歲條云：

一日，室中有議及壽昌、博山嗣續曹洞無來源，恐後不繁昌。予曰：“黃檗不云乎？‘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若承嗣馬祖，他後喪我兒孫。’”本師鬻然一笑起去。予時無著慚惶處，後因殃岷因緣²⁵，撞翻昔日年之疑，方始捉敗本師，明得古今關鍵。矢口成頌曰：“三十拄杖打瞿曇，三十拄杖打產婦。若是殃岷摩羅，教他自領出去。咦，不如緘口過殘春，啼得血流無用處。”時黃檗費兄亦有頌，予不肯，費惡發。予曰：“無庸，兄他後當作人天教主，若此頌刻出，我則詣兄座前，大展九拜，用懺今愆不遲也。”後在育王，寶華潮兄語予曰：“我時亦深疑者，則公案因兄頌子洞然明瞭。”

壽昌指無明慧經，博山指無異元來，二人為師徒關係，是晚明曹洞宗復興的高僧。此段文字記載了費隱容與木陳忞對壽昌博山系曹洞宗傳承問題的爭論，時間在通容《嚴統》刊印之前20餘年。道忞所云黃檗之語見宋僧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九，是舉舊公案講新問題，語義雙關。通容輯著《祖庭鉅鑑錄》云：“黃檗因百丈舉馬祖一喝明機，終嗣百丈，而不嗣馬祖，以親聞而面稟故也。百丈猶疑之曰：‘子以後莫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此雖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而亦師承為萬古法要，人面稟嘉猷，有蒙受用，不可欺心故也。又明主張此門，必不可無師承，而濫外道也。”²⁶這段話正

文藝研究

是通容對師承的見解，其實就是針對曹洞宗來源問題而發的。通容認為壽昌無明慧經雖然是曹洞宗法派，但沒有明確的嗣法關係，他非常反對缺乏根據的“編撰”，這些疑點促使他花了20多年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最後才編出了《五燈嚴統》。陳垣先生批評通容“著書太易”，恐怕不是很恰當，若拿來批評道忞就沒問題了。

由於《自譜》是在“嚴統之誣”後所寫，故上述文字多有矯飾之嫌。“嚴統之誣”道忞亦在被告之中，所以事發時他只好緘口不語。文中“後因殃嶠因緣，撞翻昔日年之疑”以及所作《頌》，意在與通容撇清關係。他認為曹洞宗來源是曹洞宗事，應由曹洞宗自己解決，作為臨濟僧不如緘口，足見其狡黠。

崇禎三年春夏間道忞侍密雲悟於黃檗，因修《禪燈世譜》。當時通容也一同侍奉本師，而前引“後在育王”則指崇禎四年在阿育王寺事，所以道忞與通容就曹洞宗傳承問題的初諍就發生在崇禎三年春夏間。

《自譜》崇禎三年庚午（1630）三十五歲條云：

本師赴閩川黃檗之請，予侍行。黃檗為斷際運祖脫白之山，相國葉文忠公請有御藏在焉，得以博觀，因修《禪燈世譜》，復自序其端。夏終，隨本師還西浙。

道忞《自序》作於崇禎四年冬，另有同學黃端伯序作於崇禎五年春，所以《禪燈世譜》當編定於崇禎四年冬。《禪燈世譜》同樣是誤信《丘玄素碑》列“天王道悟”於馬祖道一法嗣，雲門、法眼二宗遂歸到南嶽下；而將天皇道悟列在青原下石頭希遷之後；另將壽昌博山師徒、雲門圓澄附於卷末“青原下曹洞宗”，世系則云“嗣法未詳”。全書共九卷，僅僅是修改了一下《五燈會元》目錄，重新畫個圖而已。這樣，禪宗五家在青原行思以下就只剩下曹洞宗了，而當代曹洞宗高僧又都是“嗣法未詳”。可見這是當時爭論者所基本認同的意見，而通容與道忞的吵架就在於二人對此事的態度不同。

通容《五燈嚴統序》云：

容也自機契密雲先師以來，主盟此事已

二十餘春。覽此歷來訛偽，并見斯世混淆，每捫臆痛心，不能自安。故始一知有宗門中事，便發願欲一展筆，經歷多載，未酬夙志。幸於辛卯秋，承諸縉紳先生，各具隻眼，共相較正，遂將天皇悟一枝，並子若孫，以屬青原思、石頭遷之譜，龍潭信德山鑒之下，其子若孫，仍歸馬祖一天王悟之派。自此宗眼既明，而派謀亦清。又將薦福古之遙繼，列出於“未詳法嗣”之埒。²⁷

從上引序文可以看出，通容編《嚴統》是下了很大考證功夫的。他在《凡例》中嚴厲批駁了《五燈會元續略》的種種錯誤，指出：“夫續筆傳燈，良非眇事，必使當時見信，後世足徵。貴在矢公矢慎，名正辭嚴，庶足以緝承虛接響之魄耳。”²⁸全書25卷，有五篇序，一篇凡例，還附錄了相關的許多證據文字，請了許多學者、僧徒參與編校，可以說是非常嚴謹了。但問題就出在過於認真了。他在凡例中毫不留情地指摘曹洞宗燈譜的錯誤，強調兄弟宗派來源無據的事實，“大傷洞上之心”。而且，誤信《丘玄素碑》分列天王、天皇，使五家獨有曹洞宗屬於青原之下，不得不令學者懷疑其動機。於是，《嚴統》之誣就無法避免了。通容雖又撰《五燈嚴統解惑編》一卷，仍不能止誣。

既然道忞《禪燈世譜》與《五燈嚴統》編排如此相似，為何濟、洞之誣獨以通容成為被告，而道忞卻沒有受太大影響呢？

陳垣先生《清初僧諍記》謂：“或疑濟上顯學，當時尚有木陳，何以箬庵、繼起出頭，木陳不與？不知此事木陳本在被告嫌疑中，無調人資格。因木陳撰有《禪燈世譜》，列有兩天皇，誤與《嚴統》等，雲外澤《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說》曰：‘慨自《禪燈世譜》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譽為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惟欲己名之高掛傳燈以為榮乎！……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竊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為此也！’雲外，天隱修孫，亦木陳之姪禪師也，其言可謂直矣，然木陳尚不以為謗己也。”²⁹陳垣先生謂道忞“在被告嫌

疑中，無調人資格”不假，但關鍵在於道忞撰《禪燈世譜》時才三十五六歲，當時沒有太大影響力，且《世譜》極其簡略，不過一本目錄而已，也沒有興師動眾地去訂凡例、斷是非。《世譜》稱壽昌、博山、雲門圓澄嗣法未詳，也是當時取得一定認同的觀點。當二十多年後，通容以知名大和尚帶着“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務必要辯清源流的時候，狀況自然就不一樣了。

三、《自譜》傳抄源流考

《自譜》惟以抄本輾轉流傳於大埔民間，有清之世從未刊印過，所以一直不見有史誌著錄。³⁰直到二百多年後，該譜纔首次見載於溫廷敬等人所纂的《新修大埔縣誌》卷35《藝文誌·史部傳記》中，此後纔逐漸為學界所注意。

《大埔縣誌》初修於1929年，成稿於1945年。後因抗戰事起，一直到1943年纔得以鉛印行世。該書《藝文誌》載：

《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明釋道忞撰。存鈔本，未刊。

自神宗二十四年丙申起至毅宗崇禎十三年庚辰止，年四十五歲，蓋未完之書。道忞入清為清人，而此書則尚作於明，故繫之明代焉。³¹

據此可知，大埔縣人溫氏家中曾藏有該抄本，至於來自何人所藏，所述未詳。

饒宗頤先生早年續撰其父《潮州藝文誌》，曾在20世紀30年代中（1935、1937）陸續發表於《嶺南學報》。³²不過較為遺憾的是，《學報》上僅發表了13卷，且未著錄道忞《自譜》。當時《大埔縣誌》尚未刊成，可見饒先生也還未留意到這本年譜。1946—1949年，饒先生受聘總纂《潮州誌》時，因為編《藝文誌》的需要纔抄得《自譜》並著錄在《潮州誌》中。《藝文誌》為饒氏親自修撰，道忞《自譜》被編入《史部·傳記類》³³，內容均轉引自《新修大埔縣誌》。饒先生在1946年夏獲聘編纂《潮州誌》，次年春初始擬定門目與

分工，則抄錄《自譜》當在此年前後。³⁴溫廷敬是饒先生的老師，所以饒氏本自是從溫家抄錄來的。1986年，饒先生在日本東京發表《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臺集〉》一文對此事有簡要的交待，其引言曰：“余早年嘗從大埔溫克中先生處錄得忞自著《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鈔本，著錄於《潮州誌·藝文誌》。”³⁵

1938年，陳垣先生撰成《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比較了湯若望與木陳忞各方面的個體差異及兩人與順治帝之關係等問題，鉤稽出清初以兩人為代表的兩派勢力的消長及其原因。但陳先生當時尚未見過道忞的《布水臺集》和《自譜》。直至1952年夏，汪宗衍先生始從饒宗頤處抄得該譜，並寄贈一副本給在北京輔仁大學的陳垣先生。今檢汪宗衍1952年5月28日致陳垣書云：

頃從潮州人家鈔得《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一冊，僅記至四十五歲止，與《潮州藝文誌》著錄本同。惟一歲條云“不席煖者四十年”，二十歲條云“自此奔走道途不下三千里”，似作於六十歲時。此乃殘缺不完之本，不知先生曾見足本否？另郵寄呈（中有誤字，悉仍其舊），祈惠存。³⁶

所謂“潮州人家”指饒宗頤先生（見後文引汪《題記》謂“從其鄉人饒君選堂處鈔得之”可證）。

“中有誤字”一語為汪氏原文，意謂《自譜》抄本中原有誤字，仍照原本鈔錄。其實這是陳垣先生初次聽說此譜，自不可能曾睹他本，更不要說足本了。同年七月二日，援菴先生覆書謂“忞譜、節（梁廷枏號節庵）詩收到”³⁷，這時纔見到道忞《自譜》。後來汪氏在寄洗玉清副本前頁作《題記》云：“余曾抄一本寄贈援菴先生北京，援翁得之大喜，以為未見。”³⁸可見陳垣先生當時激動的心情。

汪宗衍先生是最早研究和整理《自譜》的學者。1956年夏，汪宗衍應馬來亞大學教授賀光中先生之請，將《自譜》整理本寄去發表。當時賀氏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兼任擬創刊的《東方學報》主編。³⁹是年7月15日，汪致陳書云：“《山翁

文藝研究

忞禪師自訂年譜》已付馬來亞大學印入《東方學報》中，校樣已印成，俟出版當寄上。”⁴⁰但是，直到翌年5月27日汪再次寄書於京，期間兩人中斷通訊約一年，此後的幾封新通信中也未提及寄收《東方學報》之事。今檢《東方學報》創刊號編《自譜》為第七篇⁴¹，作者署曰“釋道忞”。譜末有賀光中先生《題識》一篇，不過文中並未言及抄本來源，也未提到汪宗衍先生。詳校《自譜》之學報整理本與汪氏轉錄寄陳垣本和寄冼玉清本（下文）可知，三者可能源自同一抄本，即汪氏的原抄本。但學報整理本與汪氏轉錄二本仍有幾處文字稍有出入，說明賀氏可能在汪氏所寄稿的基礎上，另外又參校過香港大學羅香林先生抄本，或饒宗頤先生所藏抄本，因此賀氏在譜末自書題跋而未言及汪氏。

《東方學報》於1957年1月1日正式發行，但汪宗衍先生並未收到該書。與《自譜》同期刊出的還有汪先生的《屈翁山先生年譜》一文，1957年6月汪復寄書於陳援菴先生云：“拙輯《屈翁山年譜》已在馬來亞大學《東方學報》發表，俟出版寄奉教正。”⁴²遺憾的是，直到1959年12月初仍未收到《學報》，汪氏只好又寄信給陳，書云：“《翁山年譜》下帙久已印成，以《東方》編者人事改組，未以單行本見贈。”⁴³因此，汪宗衍並沒有收到過《東方學報》的成刊，自然無法寄贈給陳垣。同年12月19日，陳覆書向汪詢問：“《東方學報》與日本《東方學報》同名，是何組織？”⁴⁴30日汪回書曰：“《東方學報》為星加坡馬來亞大學出版，校內人材缺乏。皆向來徵稿者也。”⁴⁵此事自此只好不了了之了。

1960年1月，冼玉清先生為撰《廣東釋道著述考》，寄書陳垣先生徵求相關文獻。陳氏遂借以道忞《語錄》一部，並覆書云：“汪君孝博熟諳明清間粵僧掌故，何不就近商之？”⁴⁶冼玉清遂以援翁書請教時寓澳門的汪宗衍先生。⁴⁷因此汪宗衍就請人轉錄了一本，是年2月寄給當時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工作的冼玉清，並手書《題記》一篇於扉頁云：“是譜著錄於《潮州藝文誌》，無刊本。余從其鄉人饒君選堂抄得之。……余曾抄一本寄贈援庵

先生北京，援翁得之大喜，以為未見，並謂費兄確為費隱也。冼玉清教授近整理其舊作《廣東釋氏撰述考》，徵忞著作於援翁。其覆冼君書云：‘汪君孝博熟諳明清間粵僧掌故，曾贈我《道忞隨年自譜》，何不就近商之？’援翁過譽不敢當，因檢此寄之，並乞閱後代轉中山圖書館廣東文獻特藏室存之。”⁴⁸此文交代了汪氏藏抄本、汪氏轉錄寄陳本、汪氏轉錄寄冼本這幾個抄本之間的關係及其傳抄之經過。寄冼本即譜前附有《題記》、且請冼玉清閱後轉贈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特藏室收藏者，該本今收入桑兵教授主編的《三編清代稿鈔本》第101冊中。

此外，另有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清抄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羅香林抄本二種。中山圖書館藏清抄本為小楷精抄本，線裝一冊，正文及卷前題曰“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與諸本無異，獨封面題“木陳公年譜”，不書“弘覺禪師”或“山翁忞禪師”，疑為大埔鄉人所傳出的較早之本。該本三十歲條云：“且為予推考星曆曰”，曆字書作曆，或避乾隆御諱；又四十四歲條云：“後本師在通玄”，玄字缺末筆，避康熙御諱。此二處，其他各本皆不避。且與其他各本相校，此本亦最為精善，可知該本抄寫時間較早。羅香林（1905–1978）先生早在30年代即熱心研究客家及族譜之學。1936年首任廣州中山圖書館館長，大力搜集並自行手抄了大量的族譜家乘之書，尤其關注客家文獻。1949年移居香港後，更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曾開授族譜研究課程。香港大學所藏羅香林抄本題曰“道忞禪師年譜 行廬鈔存”，下壓方形朱文印“羅香林印”，前後無題跋，無抄錄時間。從羅香林的經歷來看，抄錄時間可能在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間。RC

註釋：

- 1 汪宗衍1952年5月28日致陳垣書，見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頁507。案，引文標點有修訂。
- 2 汪宗衍：《題記》，見《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扉頁，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桑兵主編《三編清代稿鈔本》第101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 3 賀光中：《題識》，賀光中主編：《東方學報》，1957年1月創刊號，頁304，《題識》載於譜後。
- 4 冼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冼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 5 汪宗衍1952年5月28日致陳垣書，見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07。
- 6 賀光中：《題識》，賀光中主編：《東方學報》，1957年1月創刊號。
- 7 冼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冼玉清文集》。
- 8 姜伯勤：《論木陳道忞——潮陽大埔林荭與清初禪宗史》，《潮學研究》第1期，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3-24。
- 9 姜伯勤：《論木陳道忞——潮陽大埔林荭與清初禪宗史》，《潮學研究》第1期，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3。
- 10 見道忞：《布水臺集》卷22，《禪門逸書》第10冊，明文書局，1981年，頁199；道忞《百城集》卷六目錄編年為“順治十三年”，國家圖書館藏。
- 11 [清]宋嗣京：《埔陽誌》卷六，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中國地方誌集成·廣東府縣誌輯》第21冊，頁484。本段引文皆出此頁，不一一出註。全文見譜前附錄。
- 12 參見《大埔縣林氏族譜》，大埔縣林氏族譜編委會編，2002年，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
- 13 姜伯勤：《論木陳道忞——潮陽大埔林荭與清初禪宗史》，見《潮學研究》第1期，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8。
- 14 參見陳垣：《清初僧諱記》卷二，中華書局，1962年。
- 15 陳垣：《清初僧諱記》卷二，中華書局，1962年，頁36-39。
- 16 詳見陳垣先生：《清初僧諱記》卷二。
- 17 參見道忞詩《辛卯九年予與靈岩諸師俱以弘法嬰難至明年春仲質獄東甌溪山險遠辛苦歸來即事賦感漫成三十韻》，《布水臺集》卷三，《禪門逸書初編》第10冊，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24。
- 18 陳垣：《清初僧諱記》卷三，頁77。
- 19 可參見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31。
- 20 陳垣：《清初僧諱記》，中華書局，1962年。
- 21 陳垣：《清初僧諱記》，第9頁。
- 22 [明]釋成正錄：《無異元來禪師語錄集要》，《叢書集成》第12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年，頁398。
- 23 張雲江：《禪史與禪思》，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266。
- 24 可參見《雲外釋錄》十四語，見陳垣：《清初僧諱記》，頁13。
- 25 “殃嶇因緣”，見《五燈會元》卷一：“殃嶇摩羅尊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難產，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難？’殃嶇摩羅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嶇摩羅：‘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嶇摩羅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 26 費隱通容輯著：《祖庭鉅鑑錄》卷二，見《叢書集成》第1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年，頁760。
- 27 費隱通容：《五燈嚴統》，《叢書集成》第13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年，頁5。
- 28 費隱通容：《五燈嚴統》，《叢書集成》第139冊，第6頁。
- 29 陳垣：《清初僧諱記》，頁14。
- 30 案：溫廷敬等《新修大埔縣志》之前，有清林杭學纂修《康熙潮州府志》、清周碩勳纂修《乾隆潮州府志》，然俱未載道忞《自譜》。
- 31 溫廷敬等纂：《民國新修大埔縣志》卷35，《中國地方誌集成·廣東府縣誌輯》第22冊，頁631。
- 32 潮安饒鐸鈍齋輯、長男宗頤補訂：《潮州藝文誌》，卷1至卷7載於《嶺南學報》第4卷第4期，1935年9月；卷8至卷13載於《嶺南學報》第6卷第2/3期合刊本，1937年9月。
- 33 饒宗頤：《潮州誌》，潮州市地方誌辦公室補編，2005年。
- 34 黃繼澍：《一段鮮為人知的修誌史事——饒宗頤纂修〈潮州誌〉探蹤》，《中國地方誌》，2005年第2期。
- 35 饒宗頤：《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臺集〉》，《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是文原載於《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集》，日本東京，1986年。
- 36 汪宗衍1952年5月28日致陳垣書，見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三聯書店，2010版，頁507。案引文標點有修訂。
- 37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08。
- 38 汪宗衍：《題記》，見《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扉頁，桑兵主編：《三編清代稿鈔本》第101冊。
- 39 按：《東方學報》於1957年1月1日創刊發行第1卷第1期，由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教授賀光中主編。賀氏原為香港大學教授，及馬來亞大學創校，欲辦中文系，人材缺乏，遂延請賀氏赴星加坡任教並擔任系主任。
- 40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第516頁。
- 41 該創刊號目錄如次：王震《易象數鉅說訂》、楊家駱《張森楷詩集新校注稿述略》、饒宗頤《新莽職官考》、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錢穆《莊子外雜篇言性義》、賀光中《歷代僧官制度考》、釋道忞《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吳天任《龍龕道場銘考》。
- 42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18。
- 43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24。
- 44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25。
- 45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25。
- 46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699。
- 47 按：1960年2月26日汪宗衍覆陳垣書云：“日前玉清三家轉示大函，過愛之言，曷勝惶愧，已將敝處所有數種寄之。木陳《自譜》則託其贈送圖書館收存矣。”見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526。
- 48 汪宗衍：《題記》，見《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扉頁，桑兵主編：《三編清代稿鈔本》第101冊。